

全军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伟大历程 不朽丰碑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 编

 军事科学出版社

暖大渡
楊橫城
寒亭
岷山
雲之
區
冬
顏
年
三
月
音



孔事不悔
遠征難
萬水千山
只等閒
五嶺逶迤
騰細浪
驚濤拍
左泥沙
拍空嵐



红军长征的战略指导和战役战术

廖国良

今年10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先后经过赣、闽、粤、湘、桂、黔、滇、川、康、青、甘、陕、豫、鄂等14个省区，穿越苗、瑶、壮、侗、布依、土家、白、纳西、彝、藏、羌、回等十几个少数民族地区，长驱数万里，彻底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征服包括雪山草地、40座高山、24条大江大河等无数的艰难险阻，在甘肃的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完成了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伟大战略转移。红军长征是一部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一座丰碑，是人类求生存、谋解放的一曲凯歌。

人们要问，红军长征为什么能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呢？应该说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应当指出，作为战略转移的红军长征，是以军事斗争为主，军事斗争的成败决定着战略转移的成败，主要是由红军来完成的。离开红军，党的工作，群众工作，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创立，都无从谈起。因此，正确的战略指导和机动灵活的战役战术，就成为红军长征取得胜利最直接最关键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①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实行了哪些主要的战略指导和战役战术，对我们又有何启示呢？这就是本文所要研讨和回答的主要问题。

一、坚持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正确规定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它制约着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和进程，关系着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成败。

红军长征是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很尖锐，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的东北三省，接着又把侵略战争扩大到关内，妄图把中国变成它的独占殖民地，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严重。而蒋介石顽固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内战政策，对日本的侵略采取妥协和不抵抗的态度，对离开根据地处于战略转移不利态势下的红军，却调动数十万大军，进行围追堵截，使红军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威胁。因此，坚持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把红军粉碎蒋介石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78页。

石的围追堵截和实现直接抗日的目标紧密地结合起来，是党中央正确判断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正确处理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关系，做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在日寇的疯狂侵略面前，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早在1932年就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基本口号。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全国人民，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1933年初，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又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权利和武装民众等三项条件下，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部队签订停战协定，共同抗日。1934年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但仍然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红7军团和红25军战略转移时，就分别称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和“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中共中央还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郑重表示，只要国民党接受“三个条件”，红军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坚持北上抗日的主张，对张国焘反对北上、坚持南下的逃跑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的吴起镇，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了接近抗日前线的陕甘地区。同年8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同年11月，红2、红6军团离开湘鄂川黔苏区，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开始战略转移，并在所经过的地区，广泛进行抗日救国宣传，积极组织各种抗日的武装团体。同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在《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全国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红四方面军广大官兵强烈要求北上，张国焘被迫同意接受北上抗日的方针。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于甘孜会师后，共同北上甘南，红军三大主力于10月在抗日前进阵地胜利会师。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表明日本侵略者即将受到我主力红军的打击，全国“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①。它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国性武装抗战的实现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从红军长征的胜利我们可以看出，党中央规定的坚持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起了根本性的决定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是北上抗日，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使红军因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① 《中央为庆祝红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

战争的失败，而被迫进行的战略退却，变为团结一致向抗日前线的英勇进军。工农红军以民族解放大业为己任，北上抗日成为红军战略转移的强大精神动力。正如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说：“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二是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战胜张国焘南下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关键。张国焘错判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反对北上抗日，主张红军向川康边地区退却，违背革命发展的大趋势，脱离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救国运动，因而必然遭到失败。三是红军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抗日救国的愿望和要求，把红军的长征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汇合起来，因而能够得到全国人民与各种爱国力量的热烈拥护和支持，成为红军长征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和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四是蒋介石反对红军北上抗日，企图消灭主张抗日的红军，逆历史的潮流而动，就在政治上输了理，必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及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抵制，就使他的军队没有战斗力，尽管前后调动百万大军对红军长征进行围追堵截，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二、组织各路红军的战略配合和相互策应

红军的长征是由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分别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出发，沿着不同的路线进行的。红军长征的整体同各路红军的长征是全局和局部的关系。而蒋介石的险恶用心，正是要利用各路红军离开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的时机、达到分割围歼红军的目的。因此，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组织各路红军的战略配合和相互策应，就成为粉碎蒋介石分割围歼红军、实现北上抗日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

在长征中，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加强了战略上统一的组织指挥，各路红军和坚持苏区斗争的红军部队，在北上抗日方针的指引下，以党中央所在的红一方面军为重心，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战略配合和相互策应，使红军的长征自始至终成为一个统一的战斗整体，使蒋介石分割围歼各路红军的企图遭到破产。

长征初期，红6军团的西征，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起了探路的作用。红2、红6军团会师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由黔东出发，向湘西发动强大攻势，调动和牵制大量湘军，策应和配合了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及在通道转兵后西入贵州、向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的转战。

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决定，放弃原定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确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并要求红军三个方面军密切配合作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红2、红6军团坚持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策应了中央红军在云贵川的胜利转战。红四方面军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在继陕南战役后，又发起西渡嘉陵江战役

和西进岷江流域的土门战役，分别歼敌一万余人，并于懋功地区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党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同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25军会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在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后，先后进行东征和西征战役，巩固和发展了陕甘宁根据地，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和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的会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红2、红6军团在红四方面军的策应下到达甘孜。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并肩作战，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南下接应，迅速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三个方面军互相配合、共同努力的结果。

同时还应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各根据地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以及同国民党和日寇侵略者作斗争的各种力量，他们对红军的长征都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战略上的配合作用。正如江泽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长江南北的红军队伍和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游击战争。创建陕甘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西北地区红军，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25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的东北抗日联军，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地下斗争的党组织，以及党领导的各方面力量，都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斗争。他们都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区别对待，利用矛盾，打击当前主要的敌人

由于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国民党军队内部发生分化，出现了一批爱国将领，他们不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主张出兵抗日。如蔡廷锴、蒋光鼐指挥第19路军进行的上海“一·二八”抗战；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进行的察哈尔抗日；宋哲元等部进行的长城抗战；傅作义部进行的绥远抗战。特别是被蒋介石调去围堵红军的一些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作战采取了消极和敷衍的态度。西北将领邓宝珊，不仅要求自己的军队遇有红军进攻，虚晃一枪即撤退，而且游说西北各将领谋求同红军达成协议，共同抗日。张学良、杨虎城更是同蒋介石唱反调，拒不执行“围剿”红军的命令，走上了同红军团结协作、共同抗日的道路。

蒋介石虽然调动几十万大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但地方军阀同蒋介石中央军阀之间，地方军阀彼此之间，互相猜忌，互相戒备，明争暗斗，关系错综复杂。蒋介石经常采取一箭双雕的手法，既对付红军又削弱地方与非嫡系势力，强化自己的“一统天下”。地方军阀为维持自己的“土皇帝”地位，力图摆脱中央军阀的控制，避免被蒋介石削弱和吞并，而在与红军作战时，则推脱应付，以达到保存实力的目的。地方军阀彼此之间，则是“坐山观虎斗”，希望对手在与红军的作战中失败，自己坐收渔人之利。由于这些原因，

蒋介石很难掌控和指挥自己的军队，经常出现战略协调和战役战斗配合方面的问题。

根据上述情况，党中央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创造性地运用于军事指导，从战略的高度积极做好军事统战工作。一方面，实行区别对待的原则，争取和团结一切主张和可能抗日的国民党军队，扩大抗日的军事同盟；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集中主要力量，打击卖国反共的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正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国民党内部的“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红军长征前夕，鉴于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对参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不但不积极，而且表示愿意和红军合作，于是党中央派出红军代表何长工、潘汉年同陈济棠的代表，在寻邬举行秘密谈判，达成五条协议。其中第五条就是：“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行动前将所经过之要点告诉粤军，粤军后撤40华里，让红军通过。”^①这个协议，对于中央红军最终决定长征开始的时间和突围的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陈济棠基本遵守了此前达成的协议，稍加抵抗即全线撤退，让红军经过粤境，使当时带着大量辎重的八万多人的长征队伍，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顺利地通过了蒋介石在湘粤边界部署的三道封锁线。

红军长征途经的省区，大都位于我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这些地区，军阀众多，派系林立，矛盾尖锐。中央红军在通道转兵后，进入黔、滇、川地区。蒋介石抓住这个机会，力图削弱地方军阀的势力，加强中央的控制。红军突破乌江后，蒋介石即将黔北军阀侯之担撤职查办，并令中央军薛岳部长驱直入进占贵阳。薛岳坐阵贵阳和省长王家烈争权夺势，放松对红军的作战，使红军趁机得以休整，党中央得以召开重要的遵义会议。云南军阀龙云同蒋介石和贵州军阀都有矛盾，龙云派兵入黔是想堵红军于黔，如果红军入滇，就打算只追不堵，把红军赶出云南地区了事，而对中央军入滇，则坚决反对其进入昆明。四川军阀之间，为巩固自己的地盘，更是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同时极力阻止中央军入川。当蒋介石以协调围堵红军为借口，派参谋团插足四川，就使他和四川军阀之间展开了控制和反控制的激烈斗争。朱德、刘伯承利用他们在川军的老关系，分别给一些川军的将领写信，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呼吁他们勿与红军为敌，并与集结在雅安一带堵截红军的杨森部队达成暂不互相进攻的协议。这些就为中央红军在川滇黔地区的转战、北渡金沙江，实现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红2、红6军团途经川、黔、滇地区时，就利用各种关系给各省的国民党军官写信，表示愿意

^① 何长工：《难忘的岁月》，第327页。

和他们订立停战协定，一致抗日。一时间，川黔边的各派反蒋力量，纷纷前来接洽，表示愿意合作。转战黔滇边地区时，滇军孙渡部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使红2、红6军团得以集中主力对付国民党中央军，得以在黔西、大方、毕节地区休整20多天，建立临时政权，组织抗日团体，扩大红军。红四方面军和川陕根据地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并取得西渡嘉陵江等战役的胜利，充分利用四川军阀之间的矛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红军长征进入西北地区后，蒋介石随即调动数十万大军进行围追堵截。但西北各军阀和地方实力派，对蒋介石长期以来排挤和削弱他们的势力极为不满；对蒋介石借“追剿”红军，派大批中央军到西北，扩大中央势力，十分担忧；一些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强烈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党中央充分利用这些矛盾，积极开展军事统战工作，很快同邓宝珊、杨虎城、张学良达成了停战协议，在西北地区开创了共同抗日的新局面，使红一方面军的东征和西征，能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打击国民党中央军和阎锡山、马鸿逵、马鸿宾的部队。红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北上，能较顺利地摆脱敌人追击，迅速到达甘南。这就为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造成了有利态势。

四、从实际出发，运用机动灵活的战役战术

红军长征作战有着以下几个重要的特点：1. 红军的战略方针是北上抗日，而蒋介石推行的是卖国内战政策，拦阻红军北上，并企图将其消灭于战略转移途中。同时，蒋介石又占据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因此红军不可能走直线北上的路线，而是要绕道我国西南和西北的广大地区，并在冲破蒋介石的拦阻以后，才能实现。2. 敌我军力对比非常悬殊。红军的作战是对付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就必须实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3. 红军主力离开原来的根据地，处于不利的无后方依托的流动作战状态。但为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在艰苦条件下同强大敌人作斗争，同时休整部队，发展红军，解决给养问题，又需要在可能的条件下，把战略转移同争取创建根据地结合起来，逐段向北转移。4. 红军的战略转移，要通过万水千山，克服无数的艰难险阻，既要同敌人斗，又要同严酷的自然环境作斗争。5. 红军长征的主要敌人仍是国民党军队，战争的主要形式仍然是“围剿”（围追堵截）和反“围剿”，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红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主要形式，是红军战胜敌人的拿手好戏。

长征期间，英雄的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着眼红军长征作战的特点，实行了高度机动灵活的战役战术。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根据战争形势、敌我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沿途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不断调整红军战略转移的具体路线，争取创建新的根据地，逐段转移，到达抗日的前进阵地。中央红军先是计划到湘西，和红2、红6军团会合，创建根据地；通过四道封锁线后，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打算在黔北

地区建立根据地；遵义会议后，决定北渡长江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后又改变计划，北上陕甘和陕北红军会合，完成长征。红2、红6军团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先后争取在黔东、黔西北地区创建根据地；后来根据形势的变化，又转战到西康的甘孜地区 and 红四方面军会合；尔后从甘孜北上，到达甘肃的将台堡和红一方面军会师，完成长征。“逐段转移”，是红二方面军能够突破敌人围追堵截，克服艰难险阻，减少损失，高度保存有生力量的重要原因。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在川西地区和红一方面军会师；后来由于张国焘反对北上，南下川康边境辗转作战；后又从甘孜出发北上甘肃的会宁地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完成长征。红25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进入陕南地区，创建鄂豫陕根据地；后来西征北上，到达陕北永坪镇和陕北红军会合，是第一支完成长征的部队。

二是以运动战和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正确处理走和打的关系，在滇、黔、川等省广大地区，实行大范围的机动作战。红军纵横穿插于敌军重兵集团之间，声东击西，忽南忽北，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防御而进攻，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调动敌人听我“指挥”，改变战场态势，扬长避短，避强击弱，力争主动，力避被动，达到了保存自己、打破强大敌人围追堵截的目的。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转战乌蒙山、西渡嘉陵江等，就是红军长征中著名的机动作战战例。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著名战役，敌我军力对比是10比1，被称为毛泽东的“得意之笔”。赤水河位于川黔滇边地区，是一条由西向东、再向北流入长江的河流。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土城战斗，因川军实力较强，还有后续部队增援，打成拉锯战、消耗战。为从不利的战局中摆脱出来，化被动为主动，中央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黔滇边的威信（扎西）地区。这时，蒋介石调集各路敌军，妄图南北夹击，聚歼红军于扎西地区。毛泽东利用敌人以为红军要北渡长江的错觉和黔北兵力空虚的弱点，指挥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连续攻克桐梓、娄山关，重占遵义，击溃和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人，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蒋介石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这时，蒋介石又调兵遣将，妄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毛泽东为调动敌人，指挥红军三渡赤水，重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进行全军佯动，虚张声势，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把蒋介石的各路大军吸引到川南和黔西北地区。这时，毛泽东又指挥红军主力，从镇龙山地区秘密北上，然后突然向东，四渡赤水，继而又南渡乌江，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把敌人的重兵远远地甩在赤水河以西和乌江以北地区，为红军的战略转移赢得了主动。

巧渡金沙江，关键是从云南调出滇军，造成中央红军渡江北上的条件。

毛泽东借蒋介石之手，达到了这个目的。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一部向贵州东部的瓮安、黄平方向佯动，作出东进湖南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姿态，主力则直奔贵阳。此时蒋介石正由重庆飞抵贵阳督战，即调滇军三个旅到贵阳“保驾”，又令中央军和湘军，阻止中央红军和红2、红6军团会合。正当敌军向东集结之时，毛泽东审时度势，指挥中央红军，出敌不意，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敌军防线，以每天120里的速度，向敌兵力空虚的云南急进，同滇军相对而行，在昆明虚晃一枪，直奔金沙江畔，抢占了龙街渡、洪门渡，并在绞平渡偷渡成功，全歼对岸守敌，控制渡口。金沙江谷深、水急，地形十分险要。由于龙街渡江宽流急，不便渡江，除一个团在洪门渡渡江外，中央红军主力以找到的7只小船，用7天时间全部在绞平渡渡过金沙江。与此同时，红9军团也在云南的东川以西渡江。至此，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把尾追之敌全部抛在金沙江以南，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围歼红军于川、滇、黔地区的狂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转战乌蒙山，是红2、红6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的指挥下进行的。乌蒙山位于滇黔边的云贵高原。由于红2、红6军团在黔西北的发展，震惊了蒋介石，于是调集120个团的兵力，企图围歼红军。红2、红6军团退出毕节地区，进入乌蒙山与敌周旋。蒋介石以中央军3个纵队追击，2个纵队截击，还有川、滇军的配合。该地区人烟稀少，缺粮缺水，气候恶劣，道路泥泞，极易被封锁，成为红2、红6军团长征以来最艰险困难的时刻。红2、红6军团艰苦奋斗，走曲折迂回前进的路线，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同十倍于己的强敌回旋于乌蒙山区。向西、向北、向东、再向南，转战千余里，“踢死黔军，踩死川军，打死滇军，拖死中央军”的标语到处可见，使敌疲惫不堪，由90个团减到50多个团，用近一个月的时间跳出重围，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在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大加赞赏地说：“红2、6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①

西渡嘉陵江，是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等的指挥下进行的。红四方面军为贯彻向川甘边境发展的方针，同时配合中央红军在川南、黔北的活动，决定发起西渡嘉陵江战役。在渡江之前，为迷惑和调动沿江守敌，扫清渡江障碍，于积极进行渡江准备的同时，进行了陕南战役，并控制了嘉陵江东岸的大部沿江地区，造成西渡嘉陵江的有利条件。当时在西岸，敌军以53个团的兵力，建立了长达300余公里的防线，其后方至涪江沿岸兵力十分空虚。于是红四方面军决定集中主力，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环节，采取偷渡和强渡相结合的战法，实施多路而有重点的突破；在突破成功后，采取穿插迂回战术，消灭沿江防御之敌；尔后向敌纵深发展，占领嘉陵江、涪江之间广大地区，

^① 军事科学院编：《英雄史诗 丰碑永存》，第474页。

求得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西渡嘉陵江战役历时 24 天，歼敌 1 万余人，攻克 9 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至川甘边界的广大地区，打乱了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继续向西南地区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红军的长征，突出地表现了毛泽东等同志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法，导演了战争舞台上一幕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经历的战役、战斗达 600 多次，创造了许多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范例。

结束语

从红军长征的胜利及其战略指导和战役战术可以看出：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军事战略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治战略；进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能够高度地激发广大官兵的战斗精神，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阻碍进步的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其军队的战斗力必然受到减弱，虽然依靠强势可能取得暂时的胜利，但终将失败；“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的对比”^①；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同时还决定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指挥员主观指导的能力；军力的强势和弱势、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进攻和防御、前进和后退、战略指导和战役战术等等，在战争过程中是发展变化的，而不是孤立存在、一成不变的，它们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战争和作战指导必须从实际出发，着眼其特点和发展，使主观指导符合客观实际。红军长征的实践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它的基本原理，特别是战争观和方法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战胜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

红军长征胜利 70 年后的今天，尽管时代条件和战争实践发生了巨大的深刻变化，军事理论必须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对红军长征所采取的战略战术不能照搬照套，但通过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却可以帮助我们加深理解和掌握贯穿其中的战争观和方法论，这对正确分析政治和军事形势，揭示战争和军事领域的客观规律和指导规律，指导和打赢未来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作者：廖国良，国防大学教授、少将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469 页。

扎西会议与中央苏区的战略转变^{*}

姜廷玉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月在云南威信县境内的扎西等地连续召开会议（史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决议），讨论研究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部队缩编、中央苏区和红2、红6军团战略方针等重大问题。

扎西会议是继遵义会议后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扎西会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不仅使中央红军按照新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灵活机动作战，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而且为留在中央苏区及其他苏区的党组织和红军制定了战略转变的方针，指导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实现了战略转变，保存了革命的力量，为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长征。

一、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面临严峻的斗争形势，迫切需要实行战略转变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2个纵队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中央红军主力撤出苏区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组成，项英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不久又宣布成立由项英兼任司令员的中央军区，“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五个军区（闽北分区在内）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二十四师和十军”^①，继续坚持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斗争。

项英、陈毅临危受命，领导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地方武装及游击队接替红军主力防务，掩护红军主力集结，配合红军主力突围，保障红军主力行动，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得以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实行战略转移。

中共中央离开中央苏区时，赋予中央分局、中央军区的任务是：在中央苏区领导红军和地方武装以游击战争来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成果，抗击进犯之敌，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统治下去，并准备配合红军主力

^{*} 中革军委关于成立中央军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活动的指示，1934年10月22日。

^① 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1937年12月7日。

在有利条件下的反攻。同时，中革军委还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进犯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队除薛岳纵队、周浑元纵队追击中央红军外，其余国民党军队继续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迅速占领了宁都、汀州、石城、兴国、于都、瑞金、会昌等地。陈诚等指挥的国民党军队20多个师共20余万人，加紧构筑堡垒封锁线，组织地主武装，建立保甲制度，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中央苏区。在严重的形势面前，以项英为主要负责人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保卫中央苏区，抗击进犯之敌的指示，领导中央苏区军民英勇顽强地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当国民党军队占领宁都、汀州、石城、兴国等地后，中央军区命令红24师在汀州以南阻击河田之敌前进，江西军区独立团阻滞广昌之敌前进，独立第3团监视兴国之敌，独立第7团阻滞石城之敌前进。

11月下旬，国民党军东路第3师孤军冒进，由瑞金向会昌推进。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命令红24师在谢坊西侧的湾塘岗伏击敌人，以会昌地方武装作正面扼制，另命令福建军区独立团于瑞金河东岸阻击牵制增援之敌。这次战斗歼灭国民党军半个旅，击溃半个旅，是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军区部队取得的第一次大的胜利。但是国民党军发现中央苏区仍有正规红军后，遂改急进为缓进，调集兵力，企图寻找红军决战。当时江西军区和省委由于敌人的迅速推进，没有来得及布置地方工作，同时仍集结独立团阻止和破坏敌人构筑堡垒，在战斗中遭到严重损失，最后被国民党军围困在狭小地区而遭失败。

江西军区失败的教训，引起项英等中央分局领导的重视，他们开始注意加强地方武装和在群众中进行游击战争的教育。同时开始认识到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红军主力的回师上，提出了“独立作战”和“坚持斗争”的口号，在战略指导上亦开始了初步的转变。这主要表现在：

1. 派得力干部到各地领导游击战争。中央分局派张鼎丞回闽西；调中共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到瑞金西部地区组建中共瑞西特委并任书记；调中共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到闽赣省委任书记；调中央审计委员会原主任阮啸仙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派中央政府土地部原部长胡海回吉安东固地区；派李乐天到赣粤边地区，领导开展游击战争。

2. 在“三角地区”党组织内和群众中进行游击战争的动员教育。为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中央分局首先在中革军委划定的瑞金、会昌、于都、宁都“三角地区”军民中进行动员教育。12月29日，项英在瑞西、瑞金两县活动分子会议上作题为《目前敌人“清剿”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报告，号召动员一切力量粉碎敌人“清剿”，提出“一切工作为着开展游击战争”，要求“每个党员要领导游击战争，要学习游击战术”，每个区应有一个基干队伍，要扩大独立营和区游击队，以便“来团结与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中

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委在于都宽田龙泉迳举办游击训练班，组织各县区游击司令部负责人学习游击战术。

中央分局在组织上、政治上实行的初步战略转变，对于一些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和以后游击战争的坚持，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在总体上仍受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关于坚守“三角地区”指示的束缚，红24师和几个独立团依然采取正规战的作战方式阻滞和破坏国民党军对于“三角地区”的筑垒前进。1935年1月28日，红24师和独立第3团、第11团共5个团的兵力，进攻驻守赣县牛岭的国民党粤军第2师一部，由于部署失当，部队在激战中遭到严重损失，这是中央苏区进行正规战的“最后一仗”。项英和中央分局认识到牛岭战斗不但是“不应有的惨败，而且是不应有的战斗”。^①

牛岭战斗后，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三角地区”进行“清剿”，于都、会昌一线贡水两岸的国民党军南北夹击，企图将中央分局等机关及红军部队封锁在狭小地区内一举歼灭，中央苏区形势日益严重。这时项英和中央分局“放弃期待野战军的观念，已正式提出独立自主的口号，对于当时整个斗争的严重性也有进一步认识”。^②中央分局在这存亡继绝的紧要关头，感到已无法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坚守“三角地区”的指示，开始酝酿突围和分散开展游击战争问题。项英和中央分局在严峻的斗争形势面前认识到必须改变斗争形式，实行战略转变。

二、中央分局数次致电中央请求指示，党的扎西会议讨论了中央苏区的问题，指示中央分局实行战略转变

中共中央分局在严峻的斗争形势面前认识到必须改变斗争方式，但同时感到“变动中央给予我们的任务，只有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执行”。^③所以，项英和中央分局于1935年1月30日、2月1日、2月4日连续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中央苏区的严重形势，要求给予具体指示。项英在1月30日电文中提出：“任何紧张情况下应抽空讨论我们的问题”，“要求中央迅速给我们具体指示，适应情况执行”。^④2月1日又致电中央：“屡电谅达，无一指示，令人不解。中区环境日益紧急，迟延不决是最有害的”，“目前问题是整个行动方针，关系全国与中区前途，因此必须中央决定与指示。”同时提出：“集中行动必有立足之处”，但“目前四周无此条件”；“分散目标，便于游击，但各自为战，领导困难”。“我们行动必须根据全国形势与中央总方针决定，否则易于错误，影响工作前途”。^⑤2月4日，项英再次致电中共中央与军委：

① 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1937年12月7日。

② 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1937年12月7日。

③ 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1937年12月7日。

④ 项英关于保持现有地区或转移活动地区给秦邦宪、朱德、周恩来的请示电，1935年1月30日。

⑤ 项英关于请中央速达目前方针致朱德、周恩来、秦邦宪电，1935年2月1日。

“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还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便准备”，“中央与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请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①在此期间，中央分局召开会议，研究分兵突围问题。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留少数部队及人员继续在中央苏区活动，大部集中过信丰河；另一种意见是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散向湘赣、闽赣等地活动，中央分局领导随部队行动，继续在中央苏区领导斗争。2月5日，项英将两种意见报告中央，请中央立刻答复，“迟则情况愈紧张，则愈难。”^②中央苏区的形势真是到了万万火急的地步。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1934年10月率中央红军长征后，很少与中央苏区联系，中央分局多次请示，也未予答复。遵义会议前，虽说战争紧迫，但正如项英致中央电报中所说：“虽因行军作战忙，绝不是无复电的时间与机会。”这种无指示、无回电、无布置的情况，在客观上影响了中央苏区和各苏区的战略转变。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但常委尚未重新分工，博古仍然在中央负总责。所以，中央仍是对中央苏区及其他苏区无指示、无回电、无布置。

2月5日的“扎西会议”，中共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当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讨论了中央苏区的问题，并给“项转中央分局”发出了“万万火急”电，要求中央分局坚持游击战争，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实行战略转变。电报指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同时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电报最后指出：“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③

由于敌情紧急，中央分局接到电报后，为了不被敌人封锁在于会河（贡水）北岸，当机立断，不等中央有关“决议详情”下达，立即向于都南部转移。在于都南部禾丰地区，中央分局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13日给中央分局的详细指示电。这个指示电指出：“彻底改变斗争方式，一般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的方式”，“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

① 项英关于目前行动方针问题致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电，1935年2月4日。

② 中央分局关于行动方针和对各苏区领导问题致中共中央电，1935年2月5日。

③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给项英转中央分局电，1935年2月5日。

战争的基本原则”，“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分局手里应有一独立团。利用蒋粤接邻，在赣南、闽西一带活动，最忌胶着一地。地方领导机关亦然。”中央在电报的最后强调指出：“目前正是困难与胜利的〔分〕水界，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坚持到底，争取党的路线的胜利。”^①

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扎西开会讨论中央苏区的问题，并先后两次发电给中央分局，为中央分局领导中央苏区红军和党政机关转变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实行战略转变指明了方向。

一是指明了中央苏区战略转变的方式。为了与游击战争环境相适应，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工作方式；彻底改变斗争方式，应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方式，许多庞大的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并具体提出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负责人随游击队行动，派得力干部到地方指导游击战争。

二是提出了战略转变后进行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中央要求中央分局要把“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作为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并指出一连人左右的游击队应是基干队的普通方式，较大地区设置精干的独立营，仅在几个更好的地区设置更精干的独立团。短小精干是目前的原则。

三是为了领导和保证军事战略转变的实行，中央指示在组织上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经军分会讨论，中央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

这些，都为中央苏区及其他苏区开展游击战争，实现斗争方式和组织方式的战略转变确定了正确的原则，指明了方向。

三、中央分局按照扎西会议确定的方针原则，组织部队分路突围，实现了战略转变

中央分局接到2月13日指示电后，根据中央“望你们讨论这一指示”的要求，^②立即召开中央分局紧急会议，决定“全部接受中央的指示”，^③彻底转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并部署部队突围。2月19日，项英致电博古、朱德、周恩来，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情况；2月21日项英再次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各路部队突围方向及中央分局的行动。2月23日，中央书记处再次致电中央分局，指出在突围中应注意的问题：“所有出发游击的部队，必须绝对轻装”，“每一部队不要拥挤很多干部，即分局的一个团，也不应把分局的人都集中在一起，除项英、谭秋、贺昌三人外，其他同志可在其他的部队内负责工作。陈毅可独立领导一个独立团。分局带的工作人员全部不应超

① 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的指示，1935年2月13日。

② 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的指示电，1935年2月13日。

③ 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1937年12月7日。